



四十年来家国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xiangjiangzhoukan@163.com



搭车

易石秋

真不是夸张,在我的记忆里,1978年进入镇上(当时叫公社)读中学之前,我甚至还不知道客车长什么样儿,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搭车这档子事了。

我们家地处湖南最北端的岳阳县毛田区(当时县里的派出机构)大云山腹地,路途僻远,地势险要,崎岖难行,交通十分不便。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才有十分简易的县级公路通到区公所沿途的乡镇。路逶迤于群山之间,让人头晕目眩。那时能够看到手扶拖拉机都很兴奋,偶尔有大货车经过,则要欢呼雀跃着汽油味追出好远。至于客车,除了在电影里朦朦胧胧地见过几回,连这样的概念都很少在脑海之中出现,因为对于一个长期穿着草鞋或者打着赤脚在村子里转圈的孩子来说,那毕竟是一个太过遥远的梦。

我对搭车的最早记忆,源于父亲农闲时节偶尔被生产队里委派去岳阳城里搞副业。那时我们乡里还没有通汽车,区里也就一趟,还不准时,并且要反方向走20多里,既费时费力又不划算。最稳妥也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去20公里开外的中心集镇甘田搭车,那里不仅有正式班车,还有几趟过路车,距离岳阳也更近,车票钱要便宜三分之一。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很早就弄好早餐,让父亲早吃过赶路,自己则带着我们几兄弟姊妹站在高高的山头上,久久地目送父亲的身影一直消逝在遥远的大山深处,让不少不更事的我们也跟着涌起一种别样的情感。

也许是榜样的作用,也许是生活的重压,也许是即使想搭也必须走一半里路才能到区里沿线的乡镇去上车,读高中的两年里,尽管距学校有近30里山路,每周要往返近60里回家一趟带米带菜,我一次车也没有搭过。

第一次搭乘客车是1981年,我们那里刚刚开始通客班,一天一趟。我因为在那场改写命运的高考选拔中超水平发挥,赢得了到岳阳城里体检与填报志愿的机会,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坐客车了。我特地起了个大早,可当我踌躇满志地早早赶到距家几里之外的镇上临时露天车站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等车的客人。原来这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联产承包,几个月之后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分田到户了。伴随着思想解放而来的,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进城做点小生意或务工的人员渐渐多了,班车的开通也许正是顺应这一需要的产物。

33年之后,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搭车的情景。那车真挤呀,严重超载。当时正值一年之中最炎热的季节,车上就像一口巨大的蒸笼,让人难受极了。汽车行走速度非常缓慢,不到70公里的旅程走了4个多钟头。一下车我就忍不住哇哇吐起来。

后来去省城上大学,毕业后回岳阳任教,搭车的机会与次数自然多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车留给我的印象还是挤,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带着妻子、小孩回老家过春节,又要抱小孩,又要提年货,在人流之中左冲右突,连上车都成了一场不小的战役。

进入20世纪,要致富先修路的观念深入人心,修路已上升为乡村基本建设中的头等大事。国家在财政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特地拨出大笔专项资金用于村级公路建设,同时为了刺激乡民的修路热情与参与意识,要求地方财政配套一部分,乡民自筹一部分,让每一个村民都自觉地站到乡村公路建设的队伍中来。乡村公路的等级与里程都有了很大的进展,班车的数量与班次也增加了,搭车比原来方便快捷了许多,除过年以外基本上看不到拥挤的情形了。

近年来,“美丽乡村”战略稳步推进,“村村通”政策不断深入,国家对乡镇公路的投入与补贴不断加大,不仅拓宽与平整了县级公路的主干线,铺上了柏油,大大提高了行车速度,缩短了运行时间,坐在车上平稳舒适多了。

清明前几天,好一段时间没见面的堂弟突然打来电话,要在清明同我一一道回老家看看。我以为堂弟要坐我的便车回去,忙说单位的公车已改革了,我打算去汽车站搭乘班车。堂弟一听笑了,说他开车来接我。我闻言一惊,这个堂弟家境贫寒,没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在街上打工,尽管做事勤快,脑子也灵活,但娶妻生子,落户置屋,也应该是累得够呛。早年出来还要为车票钱发愁呢,没想到现在也开上自己的车了。

第二天,堂弟果然开着一辆崭新的小车来接我,汽车亮晶晶的漆水映着他饱满而有些许沧桑的脸,显着一种人到中年的成熟与自信,我想他现在一定生活得很是开心。透过车窗,我看到的不仅是满目的青山,小楼林立的乡村,更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沧桑巨变。



陈定国：

打捞洞庭民歌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曹纯

先猜一个谜语：家里哪个大？天下哪个大？数目哪个大？时间哪个大？打一常用政治名词。

这条谜语出自《陈定国诗谜选》，该书收集了500首谜语，全部用洞庭湖民歌手法创作而成。民歌写谜语，全国都少有。陈定国通过民歌、曲艺、方志、地名等表达途径，挖掘、传承洞庭湖区乡土文化，几十年一路走来，至今腿不停、笔不辍，不时弄出新成果。

上面谜语的谜底是“祖国万岁”，读者朋友，猜着没有？

钟情洞庭民歌，要将“文化金牌”传下去

浩渺洞庭湖，周极八百里，湖水连天天接水，洞庭民歌宛如洞庭湖里的水一样多，成为湖湘文化特色鲜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陈定国1936年出生在南洞庭湖边沅江市共华镇白沙洲村，2000年从市文化馆退休，一直住在县城，可一有空闲，他总喜欢回到生养之地走走、看看。有一回，一位儿时玩伴跟他说：“定国，我们饭是吃饱了，却空着肚子过日子。”说的是群众缺少喜闻乐见、乡土味浓厚的文化生活。这里曾经是洞庭湖有名的“诗窝窝”，1958年国务院授予白沙洲“诗歌之乡”称号。当时，年轻、高颜值的陈定国在这里担任农民创作组组长、俱乐部主任，和一批有志青年发动群众学文化，作民歌，演戏曲，用青春热血、汗水智慧，结晶出白沙洲“文化金牌”，有680多位村民参加创作活动，白沙洲一时间声名鹊起。陈定国诗歌《共产党是带路人》等一批优秀作品广为流传。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定国先后3次代表沅江出席全国英模表彰大会。

洞庭湖地区的山歌，多是渔民轻轻摇船，轻轻撒网，一路划船一路唱歌，自然流露，轻松流畅，山歌多用比兴、替代、隐喻、迂回的表现手法，追求简练、含蓄、生动、形象的表达效果，特别讲究构思奇妙，调句灵动，意境精彩，富含情趣和美感。最解不开的乡愁是飘香的故土、燃烧过的青春，陈老决心把白沙洲“这块‘金牌’永远传下去”！2013年，他向共华镇党委提出建议，以白沙洲为点，成立共华镇农民诗社，把全镇带动起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4年来，他5次带着专业老师到共华镇培训农民诗友，为增进授课效果，有时走进家里开家庭培训课，面对面讨论作品。

现在，共华镇10个村，村村都有农民创作组，办起了内部诗刊，一季度出版一期，全镇2100多人参加写诗，还有10个舞龙队、秧歌队，经常演出，群众文化活动持续高涨，当年的文化景观重新回来：犁田种地忙干活，汗水浇开诗窝窝；田边休息打腹稿，收工回家细琢磨。你一首来他一首，天天都有新创作。

不断拓展创作领域，靠崽伢子拿钱把书出

陈定国写山歌写出了名，当时沅江报社、益阳文联等单位想挖他走，白沙洲大队留住不放，他依然不停地写山歌、作曲艺。1984年，省人事厅通过考试确定他达到中文大专毕业水平，准予录用为国家干部，老陈成为沅江县文化馆一员，其时年近半百。

时代推动新诗不断发展，不少人对民歌不屑一顾。陈定国对同事说：“如果任由这样下去，不要多少年，青年人就不会知道民歌是个什么东西了，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就会失传。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于是，他以一己之力搞“大工程”，系统收集整理洞庭湖民歌。他与妻子刘翠娥走渔村、上渔船，访渔民、采渔史。一年以后，由200首新情歌组成的《洞庭情歌》正式出版，不久被中国文联等单位评为特级作品，参加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博览会展览时，大会向全球拍卖、出售版权，洞庭民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

界。

陈定国以前很少写儿歌，近年在与幼儿园、小学孩子们接触中，发现他们普遍缺乏艺术的感染力。他想，用艺术的形式启发小朋友感知生活美感，民歌上口、易记、易懂，恰好适合孩子们的特点，孩子们从小与民歌亲密接触，自然日久生情。他磨了一年，写出400首儿歌，经常到附近幼儿园、小学去念给老师、孩子们听，还发动小朋友们一起写儿歌。

2004年以后，他用洞庭民歌来“玩”灯谜，还受相关单位邀请承担了《沅江市文化志》的编写任务，因需要进文化局档案室查阅资料，他常到得太早，别人没上班，被“铁将军”拦路。局里知道这事，给了他一把门钥匙，他便自由方便，整天与档案为伍。几年来，陈老编写出《沅江市文化志》《沅江市民歌志》等7部志书，多本志书荣获省级奖励。他还撰写、主编了《沅江市名人录》《历代名家咏沅江》《洞庭湖民俗》等文化普及著作。他自己统计，几十年来创作出版的文艺作品总字数达到600多万字，其中光民歌就有3000多首。

除志书外，陈老自费出版自己编撰的书籍。他两夫妻工资都不高，出书的钱全靠两个在外工作的儿子资助，前后已花去10多万元，两个崽都理解支持父母，劝爸妈不用为出书的费用担心。书出来以后，陈老从来不卖，只送人或给相关单位作资料收藏，他说自己只传承弘扬乡土文化，不为了赚钱。

满湖打捞历史遗珍，为的是留住老地名

“白沙洲村与富足村合并，取名富足不妥。”两年前的某一天，陈老一大早急匆匆赶到沅江市民政局，找到相关领导建议在合乡并村中，保留“白沙洲”这个历史地名。他说：“取名富足，是有人认为如今村民富足了，应该肯定成绩，这种做法却忽视了历史文化。地名是历史文脉之根，白沙洲这个名字，镌刻着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他向在座的民政工作人员介绍，很多历史名人都曾经讴歌赞美过这里。保留白沙洲这个地名，有利于褒扬真挚的家国情怀，延续浓浓的湖乡文脉。

最后，沅江市、共华镇重视了陈老的意见和建议，白沙洲村、富足村合并，村名定名为白沙洲村。诗情画意的水乡沅江，地名文化十分丰富，李白、杜甫、欧阳修、朱熹等文化名人曾在这里留下印记，石矶湖、景星寺包含了岁月风霜，凌云塔、万子湖见证了文运兴盛。在挖掘、创作民间文艺时，陈定国一直对地名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将民间搜集的故事编辑成册，出版了《沅江老地名故事》，宣传地名文化。

第二次地名普查中，陈老参与普查数据整理核实工作。他不要报酬，兢兢业业修订更正几十处错讹地名，不顾耄耋高龄，实地调查挖掘老地名故事。有一次，去草尾镇采访，走到半路突然发病，腹部剧痛，激烈呕吐。他咬紧牙，忍住痛，慢慢地往前走，找到一位老渔民坚持做完采访。对新安村“新安”这个名字的来历，一般人以为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有了新的安身之所，谓之“新安”，这位老渔民却讲了一个传说千载的由来：南宋时期，农民起义领袖杨么在战场上发现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便在青草湖建孩儿城让孩儿重新安家，“新安”一名由此流传至今。此时，陈老痛得直不起腰，蹲在地上缩成一团，随行者找来小车将他送进了医院。他一边打吊针，一边写出了“新安”老地名来历的故事。

在全国“寻找最美地名故事”征文活动中，沅江由于广为发动，写出了20多篇反映地名文化的佳作并参赛，结果，湖南4篇作品在全国得奖，沅江占了3篇。沅江的3篇中，两篇出自陈定国之手。去年12月，国务院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特邀他至北京出席全国地名文化保护与传承座谈会并发言。

妻子的笑容像姑娘般灿烂

说陈定国，不能不说他的妻子刘翠娥。妻子比他小15岁，是一名小学老师。陈老在书中

这样称赞妻子：“既是随身‘秘书’又是热心‘保姆’，既是特聘‘编辑’又是第一读者，既是启蒙老师又是贴心学生。文化程度比我高，懂拼音，在音韵上是‘活字典’，帮我反复推敲用词。”

刘翠娥说丈夫最大的特点是时不空过、路不空行，走路想几句话打腹稿，回家赶紧记下来；每天除了看新闻，其他工作时间都在搞创作。她坦言当年看上陈定国，是被他的行为感动了，“诚实纯朴，好学勤奋”。

结婚以后，为了让丈夫称心、专心、安心搞创作，刘翠娥心甘情愿承担起几乎所有家务，连不小心跌倒摔断肋骨，住院十多天，也死活不要他到医院陪伴。

陈定国也处处呵护妻子，全心营造欢乐的家庭氛围。从不怎么花钱的一个人，甩出大几千元请沅江最好的婚纱摄影师，给爱妻拍出4厚本精美无比、光彩照人的婚纱艺术照。刘老师如今每次翻看这些照片，笑容都像18岁姑娘一样灿烂。

陈定国、刘翠娥用心经营的这个“温馨小窝”，多次被评为沅江市“五好家庭”“双文明户”“文明家庭”。2011年，陈定国、刘翠娥家庭被评为“全国模范和谐幸福家庭”。家庭幸福能够感染人，让陈老感悟出生活赋予文学艺术的美感，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生活每天新鲜的，创作每天鲜活的。

今年，陈老有4本书要出版，还计划明年出版《洞庭湖地名故事》一书。他说闲不下来，“都是自己要来的事”。前不久，他顶着烈日来到传说中西施洗尽铅华的胭脂湖，找村组干部、老支书挖掘范蠡与西施泛舟五湖的故事。他们向绿树掩映的湖对岸驶去，只见小舟冲开万顷玻璃镜，微风送爽荷花香，金鸂细碎浪头光。

神奇的胭脂湖哟，会让陈老打捞出怎样的惊喜来呢？

采访手记

向坚守者致敬

陈勇

陈定国老人一辈子痴心传承弘扬乡土文化，曾经与他一起写民歌演唱节目的“热角”，以及“接棒”的年轻人，不少中途辍笔改行他就，只有他像山头的巨石，岿然不动。

坚守，需要惯着秋月春风的定力。陈定国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做人不变，风格不改，他敏锐地感知身边急速变化的时代，始终坚守文艺本真，倾尽全力为群众奉献精神食粮。坚守，需要美美与共的胸襟。陈定国在接受采访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一辈子想巩固这个事”，他所要巩固的是上世纪50年代蓬勃兴起、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生活状态。为了这个初心，他除了自己拼命写出好作品以外，还几十年如一日从事文化培训普及工作，培养了一批批业余农民创作者，仅白沙洲村先后走出了120余名文艺特长人才，现在他80多岁了，还到共华镇去授课培训，该镇已有2100多人接受过他的指导。

坚守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陈定国编著了几十本著作600多万字，所获各类奖励的“红本本”摆起来比教室讲台还高，喜欢他作品的读者不可胜数。目前，他还有旺盛的创作力，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我写山歌有点‘癩’，一夜写得好几篇”。陈定国说得对，生活像一条河，你爱她爱得深，她就会回馈你很多甜美的歌。